

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

张子新

虽然国体发生了变化,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岌岌可危的蒙藏局势等原因,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清朝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通过重新加封名号,给予待遇等方式实现了各主要驻京呼图克图晋京和对北洋政府的认可。驻京呼图克图“翊赞共和”,承认北洋政府的举动,对于蒙藏地区政教上层及普通民众理解、接受共和,承认北洋政府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在对驻京呼图克图的管理上,北洋政府基本沿用清朝政策的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变通。总体而言,在北洋政府无法对蒙藏地区实施强有力管控的条件下,驻京呼图克图对稳定蒙藏局势,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北洋政府 驻京呼图克图 近代 蒙古 西藏

作者张子新,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副社长,编辑。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关于呼图克图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郑宝善、刘熙的《呼图克图考》(《新亚细亚》第6卷第3期,1933年),释妙舟《蒙藏佛教史》(上海佛学分局1935年版)中的相关部分,丁治国的《呼图克图考释》(《边疆通讯》第4卷第12期,1947年)等,关于驻京呼图克图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尤其以释妙舟《蒙藏佛教史》中的论述最为详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继续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①关于驻京呼图克图的研究进一步细化,更多开始关注驻京呼图克图个体研究。^②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绝大部分都以清代时期驻京呼图克图的研究为主,但为了完整性,又都或多或少涉及民国时期,只不过绝大部分都只是简单论及。尤其对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除了个别代表性的如章嘉呼图克图等外,还没有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被推翻,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但清王朝实行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却得以延续,并一直沿用到了北洋政府结束。从表面上看,北洋政府时期的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驻京呼图克图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6BZS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关于驻京呼图克图整体的研究主要有李德成的《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中国藏学》2011年S2期),仁青的《论呼图克图制度对青海地区民族、宗教关系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② 关于驻京呼图克图个体的研究,主要有[日]若松宽著、房建昌译:《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考——清代驻京呼图克图研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3期;邓建新:《章嘉呼图克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秦永章:《民国时期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在内蒙古的宣化活动述略》,《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李德成:《清代驻京鄂萨呼图克图考》,《中国藏学》2015年第4期;赵令志:《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朵华吉尕:《七世敏珠尔活佛洛桑阿旺成列拉杰研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等。

京呼图克图制度是对清朝驻京呼图克图的继承和沿用,但和清朝相比,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国体还是国际形势、蒙藏局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也有一些新特点。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是北洋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和治藏、治蒙政策的一个缩影,对研究北洋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治藏、治蒙政策都有一定意义。同时,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群体是民国初年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之一,对促成蒙藏政教人士对新国体的认同,以及对新成立的北洋政府的认可都发挥了一定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做进一步研究。

一、北洋政府的政策争取与驻京呼图克图的回应

北洋政府初期,新的法律还没有议定颁布,因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下令在新的法律议定颁布前,“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行”。^①但这毕竟是前清的法律,之后随着各种法律的议定颁布,这些借用的法律自然废止。就驻京呼图克图制度而言,整个北洋政府的16年间,主要是借鉴甚至沿用前清的相关法律政策,当然也赋予了一定的符合时代的新内容。

针对复杂的蒙藏局势,包括驻京呼图克图在内的藏传佛教上层成为北洋政府首要争取的对象。1912年7月底8月初,^②时任蒙藏事务局副总裁的姚锡光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称:

窃维绥远上策,贵隐浹以感情。信教自由,为列邦之通例,现当共和成立,五族一家,缔造新邦,自以维持宗教为急务,按照优待条件,蒙古各王公等,既有特殊之待遇,而各处喇嘛活佛等驻锡各边关,阐扬玄理,亦宜优加蕃赐,藉励清修。查前清理藩部则例,扎萨克喇嘛等如经典通悉,本有特恩赏给名号之例,本局详加酌核,所有内外蒙各盟旗及西藏等处地方喇嘛、活佛等,无论已否赐有名号,应准其一律开具清单,由大总统再加封号,以示优崇。

8月28日,北洋政府同意蒙藏事务局的呈请,批文称:“据呈已悉,事属可行,准由该局开单,呈候核办可也。”^③

同年3月15日,蒙古联合会的那彦图等又拟定11条,呈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咨送参议院。这就是北洋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蒙古待遇条例》颁布的背景是,在外蒙古独立事件影响下,各地蒙古王公对新成立的中央政府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蒙古各地胡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④1912年12月,蒙藏事务局议定《西藏待遇办法》七条,其中第三条即“封号如旧”,第四条为“各喇嘛俸给如旧”。^⑤上述两个条例的相关条文进一步明确了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上层人士的宗教地位。这对于清代时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但此时因对“共和”的不理解和惶恐,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的驻京呼图克图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心理安抚作用。

北洋政府初期之所以沿用前清呼图克图制度,最直接的根据则是北洋政府承诺遵守的清

① 《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

② 因为姚锡光是1912年7月29日才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署总裁”(《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据此推测,这一呈文的时间大约为7月底8月初。

③ 以上均见《政府公报》1912年九月初一日第124号。

④ 《北京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⑤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第135页。

帝退位诏书。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以清廷名义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之“满蒙回藏待遇条件”部分,即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的条文。这里所谓的蒙藏原有之宗教,主要指的就是藏传佛教。因为至少到1924年时北洋政府仍在按承诺遵守,^①因此“满蒙回藏待遇条件”事实也成了北洋政府蒙藏政策的组成部分,驻京呼图克图制度得以在北洋政府时期长期存在的依据之一即在于此。

这一时期严峻的蒙藏局势,也是迫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前清尊崇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原因。就西藏地方而言,清末民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拉萨动乱”,^②包括驻藏大臣在内的清廷驻藏官员和驻藏军队被逼出藏。为了避免发生西藏无中央驻藏大员的情况,1912年农历五月初九日(6月23日),北洋政府任命钟颖为驻藏办事长官。同时,在蒙藏事务局的建议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10月28日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被清廷褫夺的封号,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③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接受封号。^④1913年1月,刚返回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向全藏官员、民众发布布告,要求各地不得遵从北洋政府政令,不得供应北洋政府官员。^⑤这一布告,在部分藏区造成了一定影响。1911年12月,外蒙古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向内蒙古各盟发出号召、通告,要求内蒙古王公贵族、活佛喇嘛等呼应。^⑥各驻京呼图克图在蒙藏地方拥有重要影响,自然成了哲布尊丹巴集团积极争取的对象,例如土观呼图克图就曾“接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屡次来函”,令其“赞成北蒙”。^⑦同时,受外蒙“独立”的影响,发生了乌泰叛乱,贡桑诺尔布、扎噶尔等蓄谋“独立”,宾图王棍楚克苏隆投奔外蒙古等事件。^⑧无论是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是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们的这些举动,其背后都有着英、俄、日等帝国主义的公开或暗中支持。^⑨此后不久,就蒙藏地区的利益,英俄两国也达成了一致,并于1913年3月签订《协约》五条,相互承认各自在蒙藏地区的既得利益。^⑩

虽然这一时期包括姚锡光的呈文和《蒙古待遇条例》《西藏待遇办法》中的相关条文在内的

① 1924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了和“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同时宣布的“大清皇帝优待条件”,因此贡觉仲尼为首的西藏堪布呈文蒙藏院,要求政府明示“西藏待遇条件是否取消”,经蒙藏院于1924年11月27日报告段祺瑞执政府,执政府于1924年12月2日下达指令,称:“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暨蒙古王公待遇条件,历经颁布,大信昭然,效力确定,允无疑义。”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5页。

② 关于拉萨动乱的性质,张召庸和喜饶尼玛教授在《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一文中进行了探讨,本文认同该观点。见张召庸、喜饶尼玛:《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中国藏学》2011年第1期。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

④ 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⑤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8册),第132页。

⑥ 西盟王公招待处:《西盟会议始末记》,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续编》(第2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601—603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24页。

⑧ 白南定:《民国初期东蒙古局势》,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5—34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91页、第112—114页。

⑨ 关于英国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北洋政府对立的情况,见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6页;关于俄国一手策划外蒙独立的相关情况,见杨荣:《试论北洋政府的前期外交——关于外蒙独立与中俄交涉》,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12页;关于日本、俄国策划、鼓动东蒙独立的相关情况,见白南定:《民国初期东蒙古局势》,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13、15—34页。

⑩ 吕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台湾商务书馆1974年版,第233页。

政策法规并不是针对驻京呼图克图的,但对北洋政府而言,在蒙藏局势动荡,英俄等帝国主义蓄意干涉,而自身实力又不足以实施强有力管控的情况下,争取蒙藏地区佛教界高僧大德,尤其是与中央政府有更密切关系,且在蒙藏地区有着重要宗教影响的驻京呼图克图,不仅是获得蒙藏政教各界认可和支持的最有效措施,同时也是稳定边疆,抵御帝国主义渗透、侵略的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

清末民初,各驻京呼图克图相继请假离京并长期滞留京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政局动荡及对新成立的“共和”政府的疑惧。因此北洋政府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现驻京呼图克图对北洋政府政策感召的回应,赞同共和,进京履职的问题。在驻京呼图克图中,章嘉呼图克图的宗教地位最高,影响最大,因此他的态度和行动就显得非常重要。

1912年9月9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章嘉呼图克图启程赴京。虽然此次章嘉呼图克图晋京,在名义上仍是假满回京,但北洋政府高度重视章嘉呼图克图晋京事宜,认为“该呼图克图此次来京,与以前销假、当差不同”,应该“酌变旧制,量加优崇”。^①因此,由蒙藏事务局牵头拟定了“待遇礼节单”,该礼节单包括由蒙藏事务局牵头组织迎接队伍到张家口迎接,交通部特派花车做迎接专车,大总统袁世凯接见等。1912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章嘉呼图克图晋京,发表赞成共和的声明,并劝导内蒙古地区的蒙古王公放弃“独立”,承认北洋政府。^②10月19日,袁世凯下令加封章嘉呼图克图“宏济光明大国师”名号,并“准用其前辈所得黄轿九龙坐褥,并赏穿带膝貂褂,赏予银一万元。其商卓特巴扎萨克巴彦济尔噶勒,给用紫鞵”。^③10月30日,袁世凯同意蒙藏事务局所请,以章嘉呼图克图“道行高深,此次翊赞共和,厥功尤伟”,同意加给章嘉呼图克图年俸银一万元。^④不仅如此,11月12日北洋政府又分别加封给章嘉呼图克图之父、母辅国公和公夫人,给予其弟五等嘉禾章,赏给其经师默尔根堪布名号。^⑤

鉴于章嘉呼图克图对稳定蒙藏局势尤其是内蒙古局势的作用,^⑥1916年1月19日,袁世凯下令再封章嘉呼图克图“昭因阐化”四字名号。^⑦7月21日,再次下令,章嘉呼图克图“每年加给年俸一千元”,“并由陆军部拨马队一队,随身保护”。^⑧

紧随章嘉呼图克图“翊赞共和”的驻京呼图克图是土观呼图克图。1912年12月,时在拉卜楞寺的土观呼图克图呈文袁世凯,表达了“派员呈进赈品,并愿开导、解释、赞助共和”的意愿。这一呈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各主要驻京呼图克图对新建立的民国政府的态度,以及佛教高僧以佛教观念理解“共和”政体的情形。兹录主要部分如下:

大总统殿下:

敬肅者。本呼图克图世受国恩,谨遵前世教育,推广教务,维持已久。兹仰赖我大总统五族共和,成立中

①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②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③ 《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

④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177页。

⑤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26页。

⑥ 其中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章嘉呼图克图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持支持态度。参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3),第17页。

⑦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95页。

⑧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27页。

华民国,五族人民共享幸福,本呼图克图实深钦佩之至,且我佛教法道从无阶级之分,惟以勤习经卷普济群生为宗旨和精神,适与本佛教法道更相符合,故先遣派沙毕呈进大总统赆品,其所遣达常斯达巴中途患病,旋回未久身故。今本呼图克图复遣派沙毕副常达斯达巴菲色木布、德钦扎巴等呈进大总统无量寿佛一尊,哈达一方,穉穉四卷,紫藏香四十束送呈。至时伏乞大总统鉴核赏收,聊表本呼图克图倾向之微忱。伏思同处今日之世,自应各竭其所能,尽力国事,以谋我中华民国平安之幸福。本呼图克图之前世喇嘛,深得各盟信仰,自各扎萨克王公以至官员人等,均有师徒之名分,本呼图克图惟情愿到处在各施主前宣布五族共和之善处,开导、解释、赞助共和不无小补,奈道路遥远,遽难立至,实属焦灼……^①

1912年12月24日,北洋政府因“该呼图克图忠于民国,不惑浮言,以黄教之宗师,赞共和之政体”,加封土观呼图克图“圆觉妙智名号,赏坐黄帷车,并赏银五千元,其派遣之沙毕常斯达巴菲色木布、得钦扎布应均给予绰尔济名号”。1913年3月,在接到袁世凯封赏令后,土观呼图克图即派遣“新给绰尔济菲色木布、得钦扎布来京当差”。^②

在章嘉呼图克图和土观呼图克图的影响下,其他各驻京呼图克图纷纷发表了“翊赞共和”,承认北洋政府的声明,并亲自或遣徒晋京,北洋政府也按例给予了封号和奖赏。各驻京呼图克图晋京及北洋政府给各驻京呼图克图封赏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1 各驻京呼图克图晋京及北洋政府对各驻京呼图克图的封赏^③

驻京呼图克图名	晋京情况	封号	奖赏
章嘉呼图克图(1892—1957) ^④	1912年8月16日晋京	宏济光明(1912年10月19日) 昭因阐化(1916年1月19日)	1912年10月,准用其前辈所得黄轿九龙坐褥,并赏穿带膝貂褂。赉予银一万元,其商卓特巴扎萨克巴彦济尔噶勒,给用紫韁 1916年7月,“每年加给年俸一千元”,“并由陆军部拨马队一队,随身保护”
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1907—1931) ^⑤	1912年遣徒晋京 1916年2月晋京	妙悟安仁(1913年3月11日)	1916年2月28日令准裁撤呼必勒罕字样 1916年4月,奉准驻京当差,支給钱粮,赏乘黄轿,穿带膝貂褂 ^⑥
敏珠尔呼图克图(1905—1937) ^⑦	1913年3月11日遣徒晋京 1924年2月晋京	广慈弘教(1913年3月11日)	1913年,赏用黄缰 1924年2月27日,循例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并赏用上辈荣典 1924年5月,准予驻京当差,赏食钱粮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22—124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31、141、305—307页。

③ 关于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东科尔呼图克图晋京及受封赏情况,除特别标注外,请见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28—135页。

④ 北洋政府时期的章嘉呼图克图是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生于1892年,1957年圆寂。

⑤ 北洋政府时期的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是第七世,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916年2月28日北洋政府批准撤销呼毕勒罕字样。1931年圆寂。晋京、封号资料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366页;(3),第71页。

⑥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96页。

⑦ 北洋政府时期的敏珠尔呼图克图是第七世,生于1905年,1909年在雍和宫掣签确定为前世敏珠尔呼图克图转世灵童。1937年圆寂。晋京、封号和奖赏资料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366页;同上书(4),第509、512页。

阿嘉呼图克图 (1910—1948) ^①	1912年阿嘉呼图克图母寺塔尔寺派代表晋京 1925年2月晋京	至善宣化(1913年3月11日预封)	1915年6月16日,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在雍和宫被掣定 1925年2月26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令准撤销呼毕勒罕字样,赏坐黄轿及承用前辈各项荣典
喇果呼图克图 (1860?—1920) ^②	1913年2月晋京 ^③	虔修静善(1913年2月25日) ^④	1913年,赏乘黄车,赉予银二千元
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 (1876—1944) ^⑤	1913年4月21日遣徒晋京 ^⑥ 1917年晋京	诚修净性(1913年5月4日) ^⑦	1913年,赏穿带膝貂褂
土观呼图克图 (1898—1959) ^⑧	1912年12月遣徒晋京 1919年4月晋京 ^⑨	圆觉妙智(1912年12月21日) ^⑩	1912年12月,赏乘黄帏车,赏银五千元 ^⑪ 1919年,赏用黄轿 ^⑫
东科尔呼图克图 (1910—1919) (1920—1983) ^⑬	1912年12月19日,遣徒晋京	明净慈祥(1913年3月11日预封) ^⑭	
那木喀呼图克图 (1901—1954) ^⑮	1912年12月遣徒晋京 1913年1月再次遣徒晋京 ^⑯	般若圆修(1913年1月23日)	1913年,赏穿带膝貂褂,赏银二千元 ^⑰

由上表可以看出,清代的主要驻京呼图克图中,除了西藏的济咙呼图克图外,其他各驻京

① 北洋政府时期的阿嘉呼图克图为第六世,生于1910年,1948年圆寂。晋京、封号、奖赏资料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558页;同上书(1),第366页。

② 北洋政府时期的喇果呼图克图为第六世,约生于1860年(咸丰十年),1884年(光绪十年)入觐,任副札萨克达喇嘛。1913年2月晋京,11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副札萨克达喇嘛。1920年七月初八日圆寂。

③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273页。

④ 《藏文白话报》第五期,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第98页。

⑤ 北洋政府时期的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为第八世,生于1876年(光绪二年),1909年被清廷任命为副札萨克达喇嘛。北洋政府时期,仍同意其支领副札萨克达喇嘛钱粮,事实就是认可其继续担任副札萨克达喇嘛职衔。1944年圆寂。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32页。妙舟法师的《蒙藏佛教史》说是1913年4月11日遣徒来京(见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2页),因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所收录的是当时档案的影印件,因此更为可信。

⑦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册),第433页。

⑧ 北洋政府时期的土观呼图克图是第七世,生于1898年,1905年被授予副札萨克达喇嘛职衔。1959年圆寂。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4),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61页。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41—142页。

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2),第141页。

⑫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61页。

⑬ 北洋政府时期的东科尔呼图克图为第十一世和第十二世,第十一世东科尔呼图克图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1919年圆寂。第十二世东科尔呼图克图生于1920年,圆寂于1983年。

⑭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366页。

⑮ 北洋政府时期的那木喀呼图克图是为第六世,生于1901年,1908年在拉卜楞寺坐床。1954年圆寂。

⑯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1册),第264、442页。

⑰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283页。

呼图克图都晋京或遣徒晋京,成为最早“翊赞共和”,承认北洋政府,接受北洋政府封赏的藏传佛教群体,为蒙藏地区政教上层理解和接受“共和”,“向心”北洋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北洋政府对驻京呼图克图的管理及驻京呼图克图的主要职责

对于驻京呼图克图的管理,北洋政府基本沿用了清朝的管理办法,但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相应改变。

1. 坚持金瓶掣签及晋京裁撤呼毕勒罕字样规定。虽然对大部分蒙藏地方缺乏强有力的直接管控,但因为金瓶掣签和裁撤呼毕勒罕字样象征的是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所拥有的主导权及管理权,因此北洋政府坚定地坚持了这一制度。北洋政府时期,主管金瓶掣签及裁撤呼毕勒罕字样的中央主管机关是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按照清廷的规定,甘青一带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既可以在拉萨的大昭寺完成,也可以在北京的雍和宫完成。^①但是鉴于这一时期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极不正常,北洋政府只能将驻京呼图克图转世掣签的地点选在北京的雍和宫。北洋政府时期的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和第十二世东科尔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就是在雍和宫完成的。1915年6月16日,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转世灵童掣签典礼在雍和宫进行,由时任蒙藏院副总裁的熙彦“恭诣雍和宫,拈香行礼”,会同护印扎萨克喇嘛伊敦加巴将两位灵童候选人的姓名缮写后封于金瓶中,然后啐经三日。6月18日,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会同护印扎萨克喇嘛,掣出策巴扎布为转世灵童。21日,奉大总统“如呈照准”的批令。^②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北洋政府时期金瓶掣签的程序基本沿袭了清朝的做法,只不过主管机关由清时的理藩院改成了蒙藏事务局(蒙藏院)。

根据道光十九年(1839)规定:“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并呈请驻京之呼图克图等,均于转世后来京瞻仰天颜之日,裁撤呼毕勒罕字样。”^③北洋政府时期,晋京后令准裁撤呼毕勒罕字样的有第七世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第七世敏珠尔呼图克图和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第七世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于1907年出生于今青海贵德县境内,由西宁办事大臣会同时在青海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塔尔寺掣定。1916年2月28日,第七世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晋京,经蒙藏院呈请,北洋政府批准裁撤呼毕勒罕字样。^④1924年2月,第七世敏珠尔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晋京,2月27日,循例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并赏用上辈荣典。^⑤如前文所述,1915年6月18日,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在雍和宫被掣定。1925年2月,第六世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晋京,经蒙藏院呈请,2月26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令准撤销呼毕勒罕字样。^⑥

2. 沿用清例,通过喇嘛印务处加强对驻京呼图克图及京师藏传佛教僧众的管理。北洋政

① (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②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2),第442页。

③ (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第164—165页。

④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96页。

⑤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509页。

⑥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4页。

府时期,除了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曾短暂担任外,^①喇嘛印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都由章嘉呼图克图担任。1913年7月,章嘉呼图克图接任喇嘛印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一职。^②其实早在1913年2月,章嘉呼图克图已经在事实上行使该项权力,曾“谕札”喇嘛印务处派喇嘛到裕隆皇后梓宫前念经。^③章嘉呼图克图请假离京时,须呈报蒙藏事务局(蒙藏院)批准,并将印务和各寺庙事务委托给其他札萨克喇嘛或达喇嘛分别护理。例如,1914年6月,章嘉呼图克图回牧“躲热”时,就曾呈请蒙藏事务局批准,将印务及弘仁寺^④事务交由禅福寺札萨克喇嘛巴拉根加布护理。^⑤又如,1925年1月,章嘉呼图克图奉令前往太原迎接九世班禅时,就曾呈报蒙藏院,将“所有京城札萨克达喇嘛印信暨弘仁寺事务”交于“妙应寺札萨克喇嘛敦柱暂行护理”。^⑥

北洋政府也有一些突破清例的做法。按照清例,副札萨克达喇嘛应是一缺,但是北洋政府时却变成了三缺,被授予该职衔的分别是喇果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显然,北洋政府采用这种做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笼络这些呼图克图,起到让他们“翊赞共和”,承认北洋政府中央政府地位的作用。

3. 坚持驻京呼图克图驻京当差制度。驻京当差是驻京呼图克图的最基本职责,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对驻京呼图克图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驻京呼图克图驻京当差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担任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等对京师藏传佛教进行管理,并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相关典礼活动。例如1919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按例派往北京的罗桑巴桑、罗桑策殿和罗桑仁增一行到京,经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报蒙藏院,蒙藏院指令喇嘛印务处查验,经署印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当堂验证合格后,罗桑巴桑被派为雍和宫擦呢特学^⑦堪布,罗桑策殿被派为雍和宫扎年阿克学^⑧堪布,罗桑仁增被派为达赖喇嘛庙达喇嘛。北洋政府时期,除了那木喀呼图克图和未到裁撤呼毕勒罕字样即去世的第十一世东科尔呼图克图外,其他各主要驻京呼图克图都有曾驻京当差的记录。而具体管理各驻京呼图克图到京报到、驻京当差、离京请假事务的就是喇嘛印务处。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政府虽然坚持了驻京呼图克图驻京当差的制度,但是因为这一时期一方面一些驻京呼图克图年龄偏小,还未达到经文娴熟的程度,理论上暂不驻京当差的理由;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更迭频繁,不利于驻京呼图克图长期驻京当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呼图克图(尤其在北洋政府后期)都是短暂驻京后即以各种理由长期请假,回到自己在蒙藏地方的寺院。

4. 按任职确定驻京呼图克图的钱粮。北洋政府时期,驻京呼图克图的钱粮,基本上沿用了清代的做法,即主要以任职确定驻京呼图克图的钱粮。因为清时各任职喇嘛钱粮数额过于琐

① 1919年,章嘉呼图克图请假离京近一年,期间喇嘛印务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由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担任。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3),第40页。

②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3册),第105页。

③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26页。

④ 道光十九年规定,喇嘛印务处专设弘仁寺。见(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第153页。

⑤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2),第16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册),第600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174页。

⑦ 即雍和宫四大扎仓之一的显宗扎仓。

⑧ 即雍和宫四大扎仓之一的历算扎仓。

细(例如规定札萨克达喇嘛每日给银一钱五分一厘一毫八丝一忽)，“易开流弊”，也不利于实际操作，于是蒙藏事务局于1913年“核准银元”，除去“奇零之数”，规定了职任的钱粮，具体如下：

各项喇嘛钱粮

- 一、食折色札萨克达喇嘛一名，每月共给洋六元三角；
- 二、食折色副札萨克达喇嘛三名，每月共计洋十八元九角；
- 三、食折色札萨克喇嘛四名，每月共计洋二十三元一角；
- 四、食折色达喇嘛三十名，每月共计洋一百七十三元一角；

……

各项喇嘛每月米石

- 一、札萨克达喇嘛一名，七斗五升；
- 二、副札萨克达喇嘛三名，共二石二斗五升；
- 三、札萨克喇嘛四名，共三石；
- 四、达喇嘛三十名，共二十二石五斗；

……

以上每月均按三十日计算，米石如改折色，每石合洋八元。^①

根据前文可知，上述材料中领取札萨克达喇嘛钱粮的是章嘉呼图克图，领取副札萨克达喇嘛钱粮的分别是喇果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②阿嘉呼图克图于1925年晋京时，也被准予领取副札萨克达喇嘛本身钱粮。^③就整个北洋政府时期而言，喇果呼图克图、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也曾短暂担任过札萨克达喇嘛。^④

虽然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呼图克图领取钱粮数额的具体记载，因为北洋政府时期驻京呼图克图钱粮的领取，基本依据了清代的规定，根据道光十九年规定，“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四人前辈俱曾驻京，品秩较大，其月廩向照札萨克达喇嘛例，支給本身钱粮一份……至其余呼图克图等，如授为正副印札萨克达喇嘛，方准照章嘉呼图克图等例支給，否则按照所授职分支领”。^⑤由此可知，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驻京时应该领取札萨克达喇嘛职衔的钱粮。至于洞科尔呼图克图和那木喀呼图克图，北洋政府时期并未亲自晋京，自然也就不会有领取钱粮之事。另外，和清代时一样，各驻京呼图克图在领取本身职任钱粮的同时，也按规定领取允许所带徒众的钱粮。例如，1925年阿嘉呼图克图晋京时，在准予领取自身钱粮的同时，所带“随从噶布楚、兰占巴二十名，每名每月各给钱粮二两”。^⑥

5. 严格限制驻京呼图克图干预政治。虽然北洋政府对驻京呼图克图在稳定蒙藏局势方面寄予了厚望，但对驻京呼图克图职责的定性仍严格限制在宗教范围，希望通过其宗教影响来达到稳定蒙藏局势，强化蒙藏地区向心力的作用，对驻京呼图克图干政则严格限制。早在1915年1月，蒙藏院就以飭文形式向喇嘛印务处转发了大总统“申令”，要求：“至各呼图克图本以清

① 《政府公报》1913年三月二十九日第321号，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第131—132页。

② 清宣统二年前，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的俸银和米石由镶黄旗蒙古都统支給，宣统二年后改食职任钱粮。民国成立后，仍支給职任钱粮。见《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101页。

③ 参见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4页。

④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273页。

⑤ （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第342页。

⑥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4页。

静为主,更无干涉行政事务之理。此次明令之后,自章嘉以次遇有具呈事件,驻京有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者,均由该喇嘛代为呈递蒙藏院核办……其所呈事件,并应以教务及所属寺庙事件为限,毋得妄干政治。”^①此飭令虽然在呈文程序上给了章嘉呼图克图一定特权,但限制干预政治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章嘉呼图克图。例如,1917年3月,章嘉呼图克图呈文北洋政府国务院,请求褒奖其“总管及管事人等”,蒙藏院“核议”后认为此举有僧人干政之嫌,因此具呈大总统,大总统下令以此举“于程序未合,其原呈所开总管及管事人等系为该呼图克图私人服役、仓上杂务之人,应由该仓上自行酌奖”,并“援引法令及成案分别核复国务院驳斥”。1918年1月,章嘉呼图克图再次呈文国务院“保荐人员及呈报留京代表衔名”。国务院“函交”蒙藏院核办,蒙藏院根据“前案并法令”呈文大总统,大总统再次以“具呈各节即经核与定制不符,所保人员应毋庸置议,其所派留京代表及头等政治顾问、秘书等名目,亦应迅令撤销”。^②并且,蒙藏院对章嘉呼图克图直接呈文国务院的做法予以斥责,1月25日蒙藏院行令喇嘛印务处,称:“驻京呼图克图遇有呈请事件,应递由本院核办。该呼图克图迭次迳行具呈,殊与程序未合。该呼图克图为驻京喇嘛领袖,并掌喇嘛印务,其举动具为众僧所瞻式。嗣后务宜恪遵法令,以资表率。”^③

北洋政府时期,驻京呼图克图的职责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翊赞共和”,劝导蒙藏政教领袖晋京,维持蒙藏地方的稳定。如上文所述,北洋政府之所以沿用清时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利用驻京呼图克图达到稳定蒙藏局势,强化对蒙藏地区统治,促使蒙藏政教上层对北洋政府中央政府地位认可的目的。例如,章嘉呼图克图就曾得到袁世凯“面谕”,并发给宣慰费5000元,要他“宣慰蒙古各呼图克图等承认共和”。章嘉呼图克图于是派出喇嘛乌勒济巴彦尔、噶尔布多勒济等分赴内蒙古各地宣慰,成功劝导喇嘛呼图克图和察汗诺们罕“翊赞共和”,并分别于1913年2月进京觐见大总统。^④土观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等,则主动在自己的教区向施主宣传、解释“共和”之意,表达自己“翊赞共和”的立场。^⑤尽管他们对“共和”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佛教思维,但他们“翊赞共和”的态度为蒙藏地区政教上层乃至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共和”,维护蒙藏地区的稳定,“向心”北洋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其二,参加例行的宗教活动和国家典礼。北洋政府时期,洞里经和迎新年经^⑥等一系列例行诵经活动仍是国家典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仍按清时时段举行,并由大总统派员参与,而驻京呼图克图仍是这些诵经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因为政体和中央政府已经发生变更,洞里经和迎新年经继续在宝华殿唸诵显然已不合适,因此从1913年起将诵经地点改到了嵩祝寺。^⑦具体诵经活动由章嘉呼图克图负责组织并担任掌坛,费用则由蒙藏事务局(蒙藏院)供给。例如1916年唸诵洞里经时,章嘉呼图克图是正殿掌坛;1917年时,章嘉呼图克图仍是正

①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2),第258页。

②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98页。

③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3),第524页。

④ 北洋政府初期,受外蒙独立事件影响,本来居住青海的察汗诺们罕忽然迁至多伦诺尔一带居住。《政府公报》1913年二月十七日第281号,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第97页。

⑤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1),第26、277、617页。

⑥ 1915年起改称新年经。见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2),第279页。

⑦ 《政府公报》1913年2月18日第282号。

殿掌坛,同时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也在正殿参加了诵经活动。^①而举行唵经活动时,北洋政府须选派人员代表政府行礼,以表达对其国家性宗教典礼性质的认可。例如,1918年和1919年的新年诵经,北洋政府分别派色旺端鲁布和祺诚武前往行礼。^②

此外,驻京当差的呼图克图也经常以蒙藏代表的身份参与各种国家典礼活动。例如,1912年10月10日民国政府举行第一个国庆节,章嘉呼图克图应邀参加国庆茶话会。又如,驻京呼图克图也是民国总统参加的元旦年例国宴的规定参与者,按规定,其与宴时着喇嘛礼服,座次列于亲王、郡王之次。并规定,届期“如有重要事故不克赴宴或应差者,须前期请假”,否则将被罚钱粮三个月。^③

这一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也参与了前清皇室的宗教活动。例如,1913年2月25日,章嘉呼图克图曾令喇嘛印务处于是日派出喇嘛20人到前清裕隆皇太后梓宫前诵经。^④同样,喇嘛呼图克图也曾“自备资斧,恭迎德宗景皇帝、孝定景皇后梓宫奉移山陵,永远奉安”。^⑤北洋政府为裕隆皇太后举行了国葬,因此上述章嘉呼图克图和喇嘛呼图克图参与的前清皇室的宗教活动,无疑是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

三、余 论

北洋政府时期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传统的延续。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中央政府常驻任职,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一种传统,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夏时期。^⑥为示尊崇,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给予了“帝师”和“上师”等最至高无上的封号。^⑦元代中央政府继承了西夏尊崇藏传佛教,封赐西藏高僧大德以崇高封号的政策,从1260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授权统领天下释教开始,先后有仁钦坚赞、达玛巴拉、意希仁钦、扎巴俄色、仁钦坚赞、桑结贝、贡嘎洛追坚赞贝桑布、旺出儿监藏、贡嘎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仁钦扎西、贡嘎坚赞贝桑布、喇钦索南洛追和喃迦巴藏卜等14位萨迦派高僧被授予了帝师封号。^⑧明朝时期,驻京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地位虽然不能和元朝时相比,但他们仍在执行明朝统治者对藏区政教领袖封赐宣抚,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充当汉藏文化交流

①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129、133页。

②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3),第26、33页。

③ 《蒙藏院行政概要》,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123页。

④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26页。

⑤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1页。

⑥ 陈庆英:《解读西藏驻京堪布贡觉仲尼到京任职的几份档案》,《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 西夏王朝对佛教高僧大德的主要封号有帝师、上师、国师、德师、仁师、忠师、大师、定师、法师、大法师、禅师等,其中帝师、上师、国师、德师为皇帝之师,仁师为皇太子之师,忠师为诸王之师。见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

⑧ 八思巴,འཕགས་པ་མཚོ་ཤོན་ཏེན་མཚན།《元史》作八合思巴。仁钦坚赞,འཇིག་རྟེན་ཏེན་མཚན།,《元史·释老传》作亦邻真。达玛巴拉,དམུ་པ་ལྷུ་ཀླུ།,《元史·释老传》作答儿麻八剌乞列,《元史·本纪》作答耳麻八剌合吉塔。意希仁钦,ཡེ་ཤེས་འཇིག་རྟེན།,《元史·释老传》作亦摄思连真,《元史·本纪》作亦摄思怜。扎巴俄色,ཇམ་པ་འཇིག་རྟེན།,《元史》作吃刺思八斡节儿。仁钦坚赞,འཇིག་རྟེན་ཏེན་མཚན།,《红史》作绛漾仁钦坚赞,《元史》作犛真监藏。桑结贝,སངས་རྒྱལ་དཔལ།,《元史》作相家班。贡嘎洛追坚赞贝桑布,ཀུན་དཔལ་མཚོ་ཤོན་ཏེན་མཚན་དཔལ་བཙུན་པོ།,《元史·释老传》作公哥罗古罗思坚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དཔལ་མཚན་ཏེན་མཚན།,贡嘎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ཀུན་དཔལ་མཚོ་ཤོན་ཏེན་མཚན་དཔལ་བཙུན་པོ།,《元史》作公哥列思冲纳思坚藏班藏卜。仁钦扎西,འཇིག་རྟེན་པ་ལྷུ་ཀླུ།,《元史》作犛真吃刺识思。贡嘎坚赞贝桑布,ཀུན་དཔལ་མཚོ་ཤོན་ཏེན་མཚན་དཔལ་བཙུན་པོ།、喇钦索南洛追,འཇིག་རྟེན་ཏེན་མཚན་ཏེན་མཚན།。见陈庆英、仁钦扎西:《元朝帝师制度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的使者方面发挥了作用。^① 清朝时期,驻京呼图克图为主的驻京僧人制度进一步完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本身就是清朝中央政府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国策的重要内容,对于将北京打造成另一个藏传佛教中心,推行治藏、治蒙政策,促进汉藏蒙满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是当时蒙藏地区特殊社会认知下的一种特殊措施,发挥了特殊作用。除了前文论述的岌岌可危的蒙藏局势外,北洋政府时期蒙藏地区的特殊社会认知也是北洋政府延续驻京呼图克图制度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蒙藏地区大部分政教上层和普通民众的认知还深受藏传佛教世界观的影响,对于当时蒙藏地区的大部分政教上层和普通民众而言,“共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有意形塑,到清末民初,当时的蒙藏各界已经普遍接受了清朝皇帝是文殊菩萨的转世,是转轮大法王的观点,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却将文殊皇帝赶下了台,这是他们难以理解的,难免感到无所适从。例如当时内蒙乌兰察布盟的扎萨克就认为“共和为扰害蒙古,抛弃佛教,破坏游牧”。^② 又如,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清朝皇帝是“明智弘善之嘉班阳^③……不敢违背”。^④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崇高宗教地位的驻京呼图克图率先承认“共和”,并出面解释,无疑对蒙藏地方各界民众去除对“共和”的疑惧,理解并接受北洋政府的正统地位有着重要作用。

驻京呼图克图仍是北洋政府最值得信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北洋政府和蒙藏地方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例如,1919年5月,章嘉呼图克图请假“出口避暑”,但北洋政府认为“该呼图克图夙宣真谛,现当修明宗教,正资咨采,所请给假之处,应从缓议”。1921年4月,章嘉呼图克图请假赴“五台山避暑”,北洋政府也以“该呼图克图导扬黄教,翕洽蒙情,诸待咨询,未便远离”为由未准假。^⑤ 这两次未准假,皆说明政府对其“咨采”“咨询”之需。此外,驻京呼图克图也经常以北洋政府代表的身份参与重要的藏传佛教活动。如,1924年初九世班禅到青海时,时在青海的土观呼图克图就被命令代表北洋政府迎接、护送来京,之后又陪同九世班禅前往上海、杭州等地。^⑥ 1925年,章嘉呼图克图奉派前往山西“慰劳班禅额尔德尼”。^⑦

总而言之,北洋政府沿用清朝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一方面反映了其与生俱来的妥协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蒙藏局势岌岌可危,而北洋政府自顾不暇,难以对蒙藏地方实施强有力的直接管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驻京呼图克图制度,至少在防止蒙藏局势进一步恶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陈楠:《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 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3册),第91页。
③ 嘉班阳,即藏语文殊菩萨的意思。
④ 张羽新、张双智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4册),第185页。
⑤ 乌力吉陶格套整理校注:《民国〈政府公报〉蒙古资料辑录》(4),第76、524页。
⑥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下),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46册),第135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5),第173—174页。